

秦军事地理变迁与秦农业地域拓展

樊志民, 朱宏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 将秦农业地域拓展研究与军事地理变迁相结合, 以探索秦农业发展的历史。研究发现, 伴随着逐渐开拓疆域, 秦农业地域拓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即据有关中, 吞灭巴蜀, 蚕食中原和取郢以为南郡; 秦之战争既有强烈的政治军事意义, 而且有着浓郁的经济色彩。

[关键词] 秦; 军事地理; 农业地域; 核心农区

[中图分类号] E29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107(2001)01-0090-05

秦农业上承三代余绪, 下启汉唐先河, 是我国传统农业奠基与演进的重要历史时期, 因此, 研究秦农业发展之历史对于剖析整个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学界于此亦着力不少, 相关著述颇丰。但总体而言, 由于拘于秦历史资料之匮乏与分布不均, 尤其是直接关于农业的资料更为鲜少这一客观实际, 研究深度颇难推进。因此, 发掘资料就成为研究秦农业历史的重要突破口; 除藉考古文物事业发展以聊补缺憾之外, 更重要是转换视角, 发掘现有历史资料中的农史价值。从目前秦史资料的分布来看, 相关于战争史的题材较为集中, 故寻找新的切入点, 使其为农史研究所用, 即显得很为重要。本文即立足于此, 把秦农业地域拓展与军事地理变迁及战争史研究相结合, 以探寻秦农业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据有关中与关中东西部农业发展的逐渐拉齐

纵观秦历史之发展, 不难看出, 伴随着军事上的逐步开拓疆土, 秦农业地域的拓展大致分为据有关中, 吞灭巴蜀, 蚕食中原和取郢以为南郡四个阶段, 下面分而述之。

有关秦人农业之源, 可远溯至其先祖伯益时代。相传伯益曾赞禹平治水土, 后又为舜朕虞, 职司山

泽, “驯育草木鸟兽”, 甚至还有种稻之记载, “令益予众庶稻, 可种卑湿”^[1], 可见其农事活动相当频繁。伯益也因之而封食于嬴(今山东莱芜境内)、秦(今河南范县东南)。夏商二代, 秦人活动西渐。至商末周初, 秦先祖因以材力助纣为虐故而“坠命亡氏, 陪其国家”, 辗转流离至“西陲之地”, 与诸戎为伍。在这种环境下, 秦人遂以战争在诸戎的夹缝中为农业发展开创空间。从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遗址的分布特点来看, 秦人入居西陲后, 是仍然固守着一定农业传统的^[2]。秦人也因之而逐渐脱颖而出。孝王时, 非子即以畜养之功而邑秦, 至宣王, 秦仲、庄公父子对诸戎的征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著名的不其簋铭文就反映了这一历史。秦从此位列大夫, 建城筑邑, 得地授民, 并以诗书礼乐为政, 这表明秦人已在西陲站稳了脚跟, 而且从农业发展角度讲, 也突出反映出秦人农业已初具规模。

西周末年, 秦人取得向岐丰之地发展的合法权利, 这是秦农业飞跃性发展之始。西周末年, 周王室内乱迭起, 犬戎亦乘机涌入关中, 弑幽王于骊山之下, 并侵挠岐丰之地。如此之势, 给秦涉足关中提供了有利时机。早在襄公二年, 秦就徙都于汧城(今陕西陇县边家庄), 使秦政治、经济中心正式进入了关中西部。襄公七年将兵而起, 以尊王攘夷为号, 攻逐诸戎, 并护送平王完成东迁。平戎救周, 使秦得以封

[收稿日期] 2000-11-27

[作者简介] 樊志民(1957—), 男, 陕西洛川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候赐地,“赐之以岐西之地”。以之为开端,秦开始了伐戎立国,开拓疆土,以占有岐丰之地的斗争。当时关中之地,诸戎满布,“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3]。“平王之末,周遂凌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4]。故自襄公始,历数代国君近八十余年的军事斗争,秦四面出击,最终才真正意义上拥有了关中西部岐丰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对于秦农业发展而言,据有关中西部之地,一方面拥有了丰沃的宜农之地,自然环境有重大改善;另一方面则尽收周余民,继承了周族先进的农业积蕴,使初秦农业在较高基点上进一步发展,从而最终完成了农业发展阶段历史性跨越^[5]。

秦在据岐丰之地后农业的飞跃发展,也成为秦国国力增强的转折点。以之为基础,秦“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经营陇西、北地、上郡等农牧交错地带;与之同时,也步步为营,拉开了进军关中东部的序幕。德公将都城由汧城东迁至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境内)即可视为肇端。至穆公时更为雄心勃勃,将东扩之矛头直指据有桃林之塞的晋国。如利用晋国内乱之机,三纳晋君,迫使晋割河西入秦;利用晋之饥荒,曾两度输粟于晋,“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史有“泛舟之役”之喻。除这些策略外,更多的还是以战争相向,著名如崤之战、彭衙之役、文官之战等等,虽然大都以秦师败绩而告终,但也显示出秦东向发展的决心与气势。由于连年征伐,秦国国力受挫,故继穆公后的几代国君总体上呈现一种固守之势,将主要精力用于国内调整与改革。尽管如此,秦与三晋之间相互攻伐亦不绝于史载。这也说明,即使在秦所谓“积弱”时代,秦东扩或东扩的威慑是依然存在的。进入战国之后,几经积聚,秦元气大复,故自厉公始,秦东扩的趋势再次明朗化,与三晋之间拉锯战也由此而出现新的转机。“厉躁二代,武功颇著”,其武功即主要指向三晋用兵。公元前461年,秦人“泾河旁以兵三万伐大荔,取其王城,补庞戏城”;灵公时为了便利指挥还曾“居泾阳”;献公即位后,更将都城迁到了栎阳。献公东都后,攻城略地,战争进程明显加速。至惠文王即位时,除几座孤城外,河西之地几乎全部为秦所占有。公元前330年,“并魏河西之地尽入秦”;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入少梁孤城以谢秦;次年秦又“县义渠”。至此,秦完全据有了河西之地。尽有河西之地,不仅标志着秦已经在战略意义上实现了“子孙饮马于河”的目标,而且也在经济意义上完成了对整个关中农区的完全占有。

秦在争夺关中东部的过程中,就开始注意到了对这一地区农业的经营与开发。关中东部之地,地处黄河流域两大原始文明中心的交缘地带,是我国早期农业的发祥地之一。但是与曾经作为西周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西部地区相比较,其农业发展水平则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特别是平王东迁后,王室式微,政由方伯,关中东部地区难有定属,或诸戎盘距,或诸侯争夺拉锯,农业生产备遭摧残。在此形势下,秦人开发经营也就成为一种客观需要。献孝二公东都栎阳,就是一个突出的标志。他们以畿辅所在为核心,拉开了开发东部农业之序幕。为改变“人不称土”的落后局面,以“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为条件招徕三晋之民移居河西;同时颁行垦草令,奖励耕战,推广县制,以促进了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经秦人百余年之努力,东部农业有了飞跃性发展,栎阳屯聚之粮草达到“二万石一积”,仅次于咸阳。关中东、西部农业水平逐渐接近,秦农业也由此逐渐摆脱了偏倚于西部一隅的局面,而开始对关中农区的整体性开发。由是观之,秦人对整个关中农区占有,不仅适应了秦东扩的战略需要,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关中农区的内在发展,有利于消除关中农区内部地域性发展差异和加强关中农区总体实力;而关中农区整体开发与发展,在秦国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秦人以此为后盾,逐渐结束了战略防御,而进入蚕食削弱诸侯为主要目标的战略相持阶段,即自此而“输毒于敌”。

二、并吞巴蜀和对巴蜀农区的充实与开发

秦完全据有关中之地后,国势大盛,其扩张之雄心昭然,故东方诸国遂结成联盟以对付强秦。秦在东扩计划屡屡受阻后,旋即有并吞巴蜀之心。巴蜀之地,不仅是重要的战略要地,而且地多沃野,物产丰饶,“大船积粟”,是一个开发较早富庶农区。秦对此覬觐已久,战国初,与蜀在汉中地区迭相争斗,即可视为秦经略西南之始。故至惠王时,秦廷即有伐韩或伐蜀之争议。虽张仪等铺陈伐韩有“挟天子以令天下”之利,但司马错却为排众议,力主伐蜀。他指出,伐蜀不仅是立足秦“地少民贫”之特点,而且可以“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材足以富民强兵”,“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从长远看,还有“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之利。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伐蜀成功,不但具有广土斥境及强兵的政治军事意义,而且具有

富国的经济意义。秦据有巴蜀之后的历史发展,也恰恰映证了这一预见。公元前316年,伐蜀遂成定议,惠王以张仪、司马错等率兵从石牛道入蜀,大败蜀兵于葭萌关,蜀遂亡。之后,秦挥师直进,灭苴、巴。公元前312年,秦“又攻楚之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遂将西南秦岭以外的广大农区纳入秦国版图之内,秦本土即与巴蜀连为一体。据有巴蜀,不仅消除了来自西南方面的威胁,而且使巴蜀丰富的物质资源畅通无阻地运往关中,这对于秦国迅速壮大无疑是有重大意义。

秦灭巴蜀之后,即采取积极措施加快对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速度。首先逐步推广郡县制。灭巴蜀之初,考虑到“戎伯尚强”和为稳定生产计,“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后来随着秦控制势力的增强,随即“但置蜀守”,不复封侯,将巴蜀汉中之地完全置于秦的郡县制度之下,这极有利于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其次,大量移民以开发巴蜀。秦初定巴蜀,就执行移民政策,“以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以实之”,此后这一政策一直持续至秦王朝建立,“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6],这些移民进入巴蜀之后,带去了秦既有的社会经济关系与生产技术,极大促进了巴蜀农业的发展和秦蜀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四川省青川出土的《为田律》,即明确反映这一点^[7]。除此之外,秦在巴蜀地区筑城邑,兴水利,修栈道等,亦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繁荣的重大举措。如著名的都江堰工程,使巴蜀之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昭王开巴蜀”,修栈道千里于蜀汉,也进一步加强巴蜀与关中之间的联系。总而言之,经过秦几代经营,巴蜀农业迅速发展,富庶几与当时的关中相媲美,后人即有“巴蜀亦关中地也”之谓。巴蜀经济繁庶,使之不仅成为为秦统一六国提供粮食兵源的后方基地,亦成为拓广西南疆域的前沿阵地,即“蜀既属秦,秦日益强富厚而轻诸侯”,“秦并六国,自蜀始”之谓也。

三、秦对中原农区的蚕食

巴蜀农区归秦后,秦既有关中之富,又“擅巴蜀之饶”,奠定了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军事基础,故随即挥师东指,向函谷关以外发展,开始了对中原农区的蚕食。

中原农区地处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沃野千里,自然条件优越,是历史悠久的宜农区,也是我国早期文明的核心地带。“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岁”^[8]。春秋战国时代,经过各国苦心经营,这一地区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呈现一片繁盛景象,“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而农业技术系统与文化系统也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有并吞八荒之心的秦国,对此富足之地也自然覬覦已久,秦武王“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秦蚕食中原,主要是针对韩魏两国而展开的。一方面是因为韩魏地当秦国东门,秦欲挥师东指,韩魏自然首当其冲;而另一方面,则在于韩魏尽得中原农区之富庶。故秦继夺西河之威,加紧对韩魏用兵。下表所列即为公元前315—公元前254年间秦对韩魏的主要战争及攻略地区。

表1既清晰地反映出了秦向中原挺进的范围与过程,同时也突出了秦在侵夺中原农区过程中的几个特点:一为逐年蚕食性的渗透与拓展;二则是目标上的选择性。特别是后者尤具经济意义。如早期秦之所以为夺取伊洛地区而不遗余力,关键在于这一地区是战国时期所罕有的城市群落^[9]。以洛阳为中心的这一城市群落,包括宜阳、新城、宛、郑、武遂等经济都会,不仅商贸富甲天下,亦是非常重要的农业区。如仅“城方八里”的宜阳一带,即“材士十万,粟支数年”。而秦以后用武之地,也几乎全为经济发达地区,如宛为冶炼中心,定陶亦以农业富庶而名天下。由此可见秦军事后面的匠心。通过以上诸战,秦逐渐进入了中原腹地。以公元前284年秦夺定陶为标志,中原农区富庶之地已尽入秦囊中。

秦在占有中原农区的过程中,很注意促进新占领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如公元前307年秦拔宜阳,即派秦使“正疆田,和人民”,以迅速恢复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公元前286年,“魏纳安邑及河内,秦出其民,而招募秦民以实之”。此后又有迁民于穰、邓、南阳等地的记载。这些措施,客观上对于促进这些地区的农业开发和科技文化交流,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秦完成对中原农区的蚕食后,关中农区即与中原农区连为一线,这样“以渭水、黄河一段和济水连成的一条东西的线为轴心”的“我国最早的农业中心”^[10],就为秦所完全据有。

表 1 公元前 315~公元前 254 年秦对韩魏的主要战争

年代(公元前)	韩		魏		说 明
	古地	今地	古地	今地	
315	石章	(不详)			韩太子质秦
314	岸门		焦、曲沃	河南陕县南	次年秦立(魏)公子政为太子
307	宜阳	河南宜阳西			
306			皮氏	山西河津	
303	武遂	山西垣曲南	蒲阪、 晋阳、封陵	山西永济、 太原、芮城	
301	穰	河南邓县			
294	武始、 新城	河南武安、伊川			
293	伊阙	河南洛阳 龙门			斩首二十四万,拔五城,涉河 取安邑以东
292			垣	山西垣曲东南	
291	宛	河南南阳	轹、邓	河南济源,邓县	
290	武遂地 二百里		河东地方 四百里		
289			河雍,向	河南孟县西	击魏至轹,取城大小六十一
287			新垣、曲阳	河南济源西	
286	夏山	(不详)	安邑	山西夏县	魏纳安邑及河内
284					夺齐定陶
283			安城、林	河南原阳西, 河南尉氏西	
276					白起取魏两城
275			启封、温	河南开封南, 温县	兵至大梁,斩首四万,魏人三 县请和
274			蔡、中阳	河南上蔡,河 南郑州东	
273			华阳、卷、 长社、蔡阳	河南郑州南、 原阳西,上蔡北	杀十五万人,予秦南阳(山西 析城、王屋二山一带)以和
268			怀	河南武陟西南	
266			邢丘	河南温县南	
265	少曲、 高平	河南孟县、济源			
264	陉城	山西曲沃北			拔五城,斩首五万
263					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
262	野王	河南沁阳			攻韩取十城
261	缙氏	河南偃师南			
260					长平之战,坑赵卒 45 万;
259	垣雍	河南原阳西			
257	郑、安阳	河南新郑、安阳			
256	阳城、 负黍	河南登封*			将军攻西周,西周君献邑三十 六、口三万
254			吴城	山西平陆北	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

四、取郢以为南郡和对 江汉农区的占有

秦对巴蜀之地和中原的据有,已经对偏居南方的楚国形成钳攻之势;同时黄河流域核心农区的全

部归秦所有,也已使山东诸国无力与之抗衡,故秦主攻方向亦由此转向楚,开始了对江汉农区的占有与经营。

早在战国之初,秦就利用与楚联盟之机向南渗透,侵吞了楚北鄙诸邑。而在诸种时机成熟后,即以

汉中、巴蜀为前沿阵地,加快了战争进程。公元前280年,司马错从陇西出兵,“因巴蜀众十万,船船万艘……沂涪陵江攻楚黔中,拔之”,迫使楚“割上庸,汉北地予秦”;公元前279年,白起率军击鄢、邓诸地,大败楚军,直指楚腹里;次年即攻取楚都郢,以郢为南郡,楚被迫迁都至陈。秦人随即涌入江汉平原。

秦破郢设南郡,标志着秦已完成对楚最富足地区——西楚江汉农区的占有。至此,秦已将当时所有发达、富庶的核心农区悉据已有;关中农区与中原农区东西相接,巴蜀农区与江汉农区上下相连。这一形势,使其综合国力大增,其疆野、经济及军事实力已超过六国之总和,故长平一役后,秦荡灭六国,一统天下,已呈人所共见之势。

秦王朝建立之后,伴随着疆域的向周边扩充,军事地理变迁与农业地域拓展的关系则更为显现。如秦进攻百越,置岭南三郡,并开发当地农业;又使蒙恬“西北斥逐匈奴”,夺河套地区,“以为四十四县”,并在此筑城郭,徙民众充实之,使之很快成为新的农业区,号之曰“新秦中”,等等。总而言之,经过秦一代的开发经营,三代时期的农牧分界线已有明显的和尽可能的延伸,秦汉疆域四至也明显映证了这一点,正如葛剑雄先生所指出的,“秦汉的统一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它们的版图同样是以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为限的,这一规律不仅符合当时疆域的实际情况,也为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所证明”^[11]。

余 论

古今战争,其主要目的不外乎有二:一为政治军事意义上的开拓疆域;二即为经济意义上的攻掠富庶之地以利国富民。纵观有秦一代征伐,其目的也无

出其右。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于秦战争广土斥境、一并六国的政治意义关注诠释者众多,而对于其经济意义则发掘甚少。实际上,把秦军事地理的变迁与农业区域拓展相联系,把秦战略目标选择与富庶发达的核心农区所处相联系,其战争后面的经济意义或者农史意义是颇为彰显的。当然,秦军事地理变迁对秦农业发展之积极作用,也不仅局限在对农业地域横向拓展的影响,而且还体现在对生产结构、生产技术乃至农业文化发展纵深方面的深刻影响,关于后一点,不是本文重点,此不赘述。

[参 考 文 献]

- [1] 十三经注疏·尚书[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
- [2] 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3] 十三经注疏·诗经·六月[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
- [4] (宋)范晔. 后汉书·西羌传. 北京:中华书局.
- [5] 樊志民. 秦农业历史研究[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
- [6] (晋)常璩. 华阳国志·蜀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7] 罗开玉. 青川秦牍〈为田律〉所规定的为田制[J]. 考古,1988,(8):728~731.
- [8] 汉·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 张鸿雁.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发展史论[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 [10] 王毓瑚. 我国历史上农业地理的一些特点与问题[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3):1~13.
- [11] 葛剑雄. 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J]. 中国史研究,1994,(2):24~27.

Military Geographical Extension and Agricultural Regional Expansion During Qin Dynasty

FAN Zhi-min, ZHU Hong-bin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Northwest Sci-Tec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act: Military geographical changes and the study on agricultural regional expansion were combined in this essay. Among all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Qin Dynasty, the relatively centralized material about the history of conflicts could be used for the study on agricultural history. With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territory, the course of the agricultural regional expansion during Qin Dynasty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firstly occupying the territory of Guanzhong; secondly Bashu; then Zhongyuan and finally appointing as the South county. The conflicts during Qin Dynasty had strong economic features as well as grea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ignificance.

Key words: Qin; military geography; agricultural region; core agricultural areas